

April 2014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Image of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ization from the Burden-Bearing to the Weightless Existence

Lixin Zh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Zhang, Lixin. 2014.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Image of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ization from the Burden-Bearing to the Weightless Existenc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2): pp.50-5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2/16>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由“负重”到“失重”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文学形象嬗变

张立新

摘要:“农民工”文学形象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紧密关联。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经济社会中文学生态的急速转变,进入主流文学言说空间中的“农民工”由改革之初负载着知识分子社会人生理想的时代“新人”,到新世纪需要社会各界关注关怀的“生存之民工”,精英作家笔下不堪重负的“农民工”形象在释放其精神能量后触底,迅速从“强者”退回到了“底层”,由“知识分子”气到“农民”化,由时代正剧中的“负重”者到后现代式生存悲喜剧中的“失重”者,在各种权力话语的形塑下,他们被不同程度地改写和简写了。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农民工”;文学形象

作者简介:张立新,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研究方向。电子邮箱:newzhang@sohu.com 本文系2010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泛媒介场中的“农民工”文学形象研究》(2010YBRW67),西南大学2009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后现代文化视野中的“农民工”媒介形象研究》(SWU0909657)成果。

Title: The Evolution of Literary Image of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ization from the Burden – Bearing to the Weightless Existence

Abstract: Literary image of the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during the process, the image of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drastic change of literary ecology. When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as characters entered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reform period, they appeared to be the “new character” that embodied the social ideal and life expect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The image changed, however,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when peasant workers became the strugglers of survival who had degraded to the concerns of almost social strata, especially the elite group. After the image of the peasant workers released the spiritual energy it had previously embodied, they rapidly fell to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their intellectual air lost while turning back to the status of peasants. When the peasant workers are deprived off the image of the burden – bearers in the heroic drama of the time, and relapse into the weightless existence in the postmodern tragicomedy, they are in varying degrees rewritten and oversimplified.

Key words: urbanization; peasant migrant workers; literary image;

Author: Zhang Lixin,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Moder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Institut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 Email: newzhang@sohu.com

“农民工”文学形象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紧密关联。改革开放之初,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整个中国都还是一个乡土中国,早期的“农民工”基本上也还是在乡土文学的视野里。和乡土有着千丝万缕精神联系的知识分子作家立足

于乡土,展开对进城农民命运的书写。虽然是以乡土为本位,但作家的历史眼光却是深远的,他们敏感地察觉到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在整个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性,有理想有抱负的进城乡村知识青年就成了乡土中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开拓者、受难者,因而人物身上往往投射有知识分

子的理想人格。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城乡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农民工”群体规模急剧扩张,精英作家笔下不堪重负的“农民工”文学形象在释放其精神能量后触底,成了地道的“生存之民工”,真正沦为了弱势和边缘,除了生存,他们已经担负不起任何与精神有关的重量,越来越被动、客体化了。在凸显商业价值的文学类型化娱乐化潮流中,“农民工”又成了消费对象,他们与城市大众的差距被刻意夸大,成了喜剧施展手脚的表现空间。在城市化进程中,进入主流文学言说空间中的“农民工”由“主动”到“被动”,由“知识分子”气到“农民”化,由时代正剧中的“负重”者到后现代式生存悲喜剧中的“失重”者,在各种权力话语的形塑下,被不同程度地改写和简写了。

一、时代正剧： 精英文化视野下的时代“新人”

80年代初期,整个社会结构还相对稳定,乡村和城市彼此还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性不大,农民进城打工主要还集中在南方经济特区等改革前沿阵地。从早期南方打工作家那种自传式写作范式可以看出,经济特区的“农民工”多是失家的“浪子”,在“别人的城市”里颠沛流离,他们对城市的期望,对人生的设计,对自我的想象,都还显得简单稚拙,他们理想受挫后直白的呼告,他们的自艾自怜、颓废、奋进,都体现出浓厚的青春气息,以及对象征着“富裕”的城市现代生活的渴求。然而,早期“农民工”题材中的“草根创作”一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主潮,影响还很有限,还无法为大众所熟悉和认知。福柯最早提出了话语即权力,对不占有任何资源的“农民工”来说,无法借重话语充分表达自己,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现状都难以改变。而占有主流话语空间的知识分子作家借重文学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发声,80年代也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被视为精神的圣殿和思考国家与个人前途的试验地,他们笔下的“农民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产物,投射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影子。

知识分子作家感受到时代社会的重大转型给农村和农民带来的躁动和冲撞,在城市经济文化的强大辐射下,进军城市的号角已经在乡村吹响。在铁凝《哦,香雪》(1982年)里,火车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现代化交通工具给僻远的台儿沟人的平静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火车每天一分钟的短暂停留诱发了乡村少女对山外那个叫“城里”的世界的无限憧憬,她们的人生也终将沿着现代化的轨道一步步向城市延伸,尽管城市对她们来说,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一个与“精神”相关的模糊的概念。作家的知识分子视角也赋予了香雪这个乡村少女知识青年气息,直接把城市现代文明等同于了知识文明,她用四十个鸡蛋去换来的自动铅笔盒,已经成了城市文明的象征,

并为此走了三十里夜路,似乎也隐喻着乡村要迈向城市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

80年代初期农民进城的道路是艰辛的,无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陈奂生想进城去增长点见识,还是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想进城去打拼出一个广阔的天地,都需要一些机缘巧合。如陈奂生在火车站因感冒发烧巧遇吴书记,才得以坐一回城市政治权力象征的“吴书记的汽车”和住上代表城市物质文明的“五块钱一夜的高级房间”。高加林因为城里位高权重的叔父才得以进城,可见横亘在城乡之间种种制度的文化的壁垒森严。香雪还仅仅是遥遥地感受了一下城市文明的气息,还没有真正被那列现代化的火车带走,还没在更实质意义上与城市打交道,城市也还没和他们的人生命运必然地联系在一起。而路遥《人生》(1982年)中的高加林则因为城里的“权贵”——转业当官的叔父而进城当了通讯员,面对面地遭遇城乡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直接冲撞和撕扯。相对于陈奂生来说,高加林是个城市文明的自觉追求者,他在县城读过高中,不满足于做个如父辈那样一辈子依附于土地的安分守己的农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在80年代的理想主义氛围下,城市的优势地位还主要体现为与物质文明相伴而来的知识文化价值上的优越性,如陈奂生那样进过城的“乡下人”就有了城市的光环,在同乡人面前就获得了更多话语权。高加林虽然几经折腾最终还是回归了土地,但他的心已经进城了,他和城市有着更深的精神联系。他短暂的城市经历,也意味着传统乡土文明主动向现代城市文明的接轨。高加林对土地的几度逃离和回归,也预示了乡土中国现实下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高加林的进城梦是破灭了,然而,随着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大,农民进城的历史趋势却是不可阻挡的。高加林在乡村和城市未走完的人生道路,分别在《平凡的世界》(1991年)里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身上继续着。路遥已经跨越了《人生》单纯的乡土文化视界,把哥哥孙少安安排在农村开拓人生道路,建设知识分子作家所构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弟弟孙少平的奋斗天地则选择在了城市。孙少平算是早期知识分子作家笔下的一个“农民工”形象,“他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新人的故事’”(雷达209)。孙少平也同样是在县城读过高中,对现代知识文明如饥似渴,要走出农村这个小天地。不管是在县城读高中时,还是在黄原当揽工汉,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下,孙少平都从没有放弃过读书,都把精神追求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知识分子气的作家思考的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背景、但拥有知识背景的普通农村青年,如何能通过个人奋斗,跨越种种制度的、文化的、外在的、自我的栅栏,在城市实现自我价值。潜意识里也是要试验一下,知识能否成为农民进入城市的通行证,能否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资本。然而,作为农民子弟,城市显然还没有给孙少平提供更多

的机会,无论黄原打工还是铜城挖煤,孙少平从事的都是不需要太多知识的简单但繁重、危险的重体力劳动,这种劳动本身离孙少平的人生价值和理想也相距甚远,只有通过一系列苦行僧似的自我磨砺来达到道德修炼的完美,来体现自我精神人格的高度。

从路遥的《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舞台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由于乡村的牵扯,更庞大的根系使高加林回到农村,而孙少平已经是扎根城市了,毕竟城市舞台更广阔得多。然而,作家在城乡之间依然表现出了价值取舍上的犹疑和困顿。从历史理性上,知识分子作家承认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认同城市文明,而从生命情感和艺术审美的角度,他们对乡村又充满了依恋,传统的乡土伦常根植于血脉之中,任何对土地的背离都面临着忘本忘根的指责和自责。路遥在《平凡的世界》的题记中宣称:“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作家即使把目光投向城市,但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情感和思维方式还都牢牢地占据着人物的心灵空间,规范着人物的言行。如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都和有知识有文化的城市女性相爱,体现了精神的高标和对城市现代知识文明的自觉追求,但最终在婚姻归宿等现实人生选择上,还是和地道的农村姑娘或者底层劳动人民牵手了,就像高加林最终对土地的回归一样,体现了改革初期知识分子作家在坚守乡土伦理和追求城市现代文明之间的一种精神人格上的分裂。知识分子作家力图通过精神救赎来弥合这种分裂,让人物具备很强的道德自律和人格操守,自尊自强,把责任和担当看得高于一切,为此宁愿放弃个人幸福,只占领道德和精神的制高点。

80年代作为改革大潮中的“新人”出现的“农民工”文学形象多为男性,90年代初红遍大江南北的主流电视剧《外来妹》(1991年)把目光聚焦在女性“农民工”这个后来通常被作为城市欲望化对象的弱势群体身上。相对于80年代知识分子话语体系中“农民工”的人生价值理想、道德追求,“外来妹”的主阵地被放在南方经济特区,经济价值已经凸显,但人格理想依然浓重。女主角赵小云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成长为一个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接受了现代的洗礼,成为具有现代品格的自立自强的时代新女性,事业上的成功人士,生活中的强者,实现了自己人生的蜕变,制造了乡村女性在经济变革时代也能依靠自我奋斗、敢于拼搏的精神分享城市现代化的成果、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神话”,激励了更多乡村女性进城寻梦。

80年代初期那些浸润着知识分子关于社会历史思考的早期“农民工”很多还是作家观念性的产物,他们大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道德上的圆满,就是事业生活上的圆满,在城市找到了自我的位置。但作家过于追求道德上的完善和精神人格的修炼,以达到对现实制度等各种障碍的逾越,从而忽略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生活真

实与人性真实。这种“向上”的写作,使社会生活本身失去了重量,而只有精神的重量。

二、生存悲剧: “底层”视点下的“生存之民工”

改革初期,“农民工”所依托的乡村还是希望的田野,是家园。90年代以来,城市和乡村两个相对自足的文化空间开始了全面深入的渗透,金钱挑战传统乡土伦理,在作为现代化中心舞台、凸显经济价值的城市面前,乡村道德上的优越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丧失,其物质和精神上的贫穷本相暴露无遗,家园沦为了“废园”,文学乡土的田园和诗意显得格外虚妄。随着城乡贫富差距加大,“民工潮”持续高涨,城市的生存法则对作为“外来人口”的“农民工”日渐显露出了它的残酷性和异质性。80年代文化意义上的“离乡”和“进城”在生存面前逐渐失去了精神含量。对“农民工”来说,离开土地到城里去,是断奶,是一场彻底的蜕变,现代化的城市也不再是别处的风景,而是生存的战场,是“农民工”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和驿站。在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和城市生存法则下,什么资本和资源都不占有的“农民工”要想在城市里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成功”的机会更少了,他们基本上挣扎在生存的泥潭里,不得不面对面地遭遇更多尖锐的城乡现实。

在“农民工”现实生存苦难的感召下,精英作家们启蒙立场逐渐淡化,视点一次次下沉,路遥时代的乡土情结已经逐渐淡漠,也少有了80年代那种在城乡之间知识分子气的精神分裂和犹疑。“当下文学叙述是实际生活远大于观念的时期”(徐德明,“乡下人”109),然而,由于身份的隔阂,现实体验的缺失,作家被“底层”想象所拘役,往往呈现出苦难和牧歌两种话语想象方式。在惯常的苦难叙事中,“农民工”已然客体化了,城市由“农民工”的梦想所在沦为梦魇场所,“农民工”进城后的身心磨难被夸大,他们不再是城乡生活的主动参与者,他们的形象被固定在了“底层”。陈应松的《太平狗》(2005年)描绘了一副阴暗惨烈的“农民工”城市打工生活图景,来自神农架的“农民工”程大种几经周折到武汉打工,城市的冷漠罪恶令这个老实巴交到城里来寻梦的乡下人被人拐骗毒打,最后惨死异乡。刚进城时,程大种“连尿意也没有,人只有一个大脑和嘴,嘴以下没了知觉”,城市这个异度空间给程大种精神上极度的压迫,他的感觉器官都“没了知觉”,整个生命处于半瘫痪状态。小说把城市作为一个极端冷漠的弱肉强食所在,看不到半点温情,“人到了城里就没个尊严了,就把脸皮取下来让人当茅厕板子踩。自己的亲姑妈都这样对待自己,还能指望城里人什么?”城里也不再“有‘农民工’们可以依傍的亲戚或权贵,‘程大种’们成了无亲无故的流民。城乡之间这种看似血缘亲情关系的断裂,实则是城市商品经济侵袭下乡土文化圈

层精神纽带的断裂。

孙惠芬说：“我觉得文学之所以存在，因为它表现的是人的心理和精神，而在精神上没有什么弱者和强者”（48）。作家过多关注“农民工”的生存之苦，从而遮蔽了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状态，以及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蜕变。李肇正的《女佣》（2001年）中杜秀兰进城做保姆，伺候一位生活不能自理的刁蛮老太太，老太太对杜秀兰极端不信任而且非常苛刻，周围的邻居也防备着从乡下来的杜秀兰，“乡下人进入他们的生活区域，就好像是盗贼出现了。”相对独立的以家庭、村落为单位的农民进城后被曝光在高楼林立、错综复杂的城市社会的公共空间里，虽有羡慕迷醉，但更多地是感到城市的冷漠和拒斥。“现代城市，其空间形式，不是让人确立家园感，而是不断地毁掉家园感，不是让人的身体和空间发生体验关系，而是让人的身体和空间发生错置关系”（汪民安129）。与之对比的是，“在乡下种承包地，她是土地的主人。她高兴种什么就种什么，高兴怎么种就怎么种，大家都喊她壮壮媳妇。在城市她是女佣人，得让人家差三喝五。”从土地的主人到城里人的仆佣，这种主仆关系的改变，从精神上刺伤了“杜秀兰”们，他们无法从土地上获得期望的现代物质生活，而商品化的城市本质上又是一种市民文化，“一切人之间的亲密关系都被一种几乎不可忍受而又无以抵御的明朗化所揭穿，那些关系在这样的明朗化中根本无法存活，因为，一方面，金钱讨厌地处于所有生命旨趣的核心；另一方面，恰是金钱又使几乎所有人间关系都停止了；所以，在自然领域如同在道德领域一样，越来越多的原始信任、镇静和健康正在消失”（本雅明28）。在“农民工”近距离的审视下，城乡之间那种因距离而产生的浪漫想象消失了，城市是铁板一块，他们无从突破，无法全面深入城市的内部和城市的日常生活空间。“农民工”作家王十月《厂牌》中，打工妹李梅因为丢了厂牌和身份证，在“只认厂牌不认人”的厂规下，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被厂里解雇。借工友林小燕的身份证四处找工作没有着落，后又被当做“三无”人员被治安员拘留，治安员以让她陪睡做交换来换回她借林小燕的身份证，拿回身份证后的李梅流落街头，精神恍惚，不知道自己是谁，听工人在唱《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在没有取得城市的“合法”身份之前，在无辜失去她的“贞洁”后，李梅要想保住她的“纯洁”就很艰难了。这个短篇借一个女工厂牌丢失事件而遭致的一系列看似荒唐的噩运，反映了“农民工”在城里身份缺失带来的一系列生存危机和精神伤害。《外来妹》时期乡村女性在城里的创业神话破灭，她们面临的是直接的生存压力和人格尊严的丧失。

一部分作家也力图从“农民工”的视角和立场出发，如贾平凹的《高兴》、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北村的《愤怒》等直接以“农民工”的第一人

称叙事，尽量贴近和触摸“农民工”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贾平凹在谈《高兴》的时候说，“许多情节和许多议论文字都删掉了，我尽一切能力去抑制那种似乎读起来痛快的极其夸张变形的虚空高蹈的叙述，使故事更生活化，细节化，变的柔软和温暖”（450）。作家赋予了进城拾荒、一心要成为“西安人”的主人公刘高兴与传统农民不同的新的质素，他积极乐观，追求精神生活，一高兴就摘下挂在脖子上的箫吹上一阵，一副文化人的派头。他不允许城里人叫他“破烂”，自觉葆有人格上的尊贵，尽管他那些自以为是“贵气”在现实面前难以维系。徐锁荣的小说《地铁站口吹箫的女人》同样把“吹箫”这个精神形象赋予了一个乡下来的保姆，心地善良的保姆阿杏受到男主人刘爱民前妻陶双英的百般刁难，阿杏非但不介意，反倒以德报怨，尽心尽责地照顾这个看不起自己的卧病在床的城里女人，在她遇到劫匪时，阿杏不顾生命危险勇敢救助。这个女主人和保姆之间的故事也暗喻了作家心目中的城乡关系，强悍的女主人代表城市强权，而弱者阿杏代表的乡村却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以高尚的情操对城里人实现了精神救赎。

刘高兴、阿杏的箫，与《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书本一样，都是作家赋予人物身上的一种努力向城里人靠拢的精神质素，在文学传统和写作惯性的影响下，作者凭借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构筑“农民工”的精神世界，过于美化诗化乃至虚化“农民工”的人性美人情美，因此笔下的“农民工”不时会人面狮身、驴头马嘴，不自觉地就流露出了书生气。在苦难、罪恶、诗意等他者化想象下，“农民工”成为被关怀、拯救乃至神话的对象。

三、城市轻喜剧： “傻根”们虚幻的精神救赎

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俗文化渐成气候，80年代那种精英式文学生产，受到市场经济下的消费文化的全面改写，“农民工”文学形象的知识分子视角被按照大众媒介的审美趣味加以有意识的误读和改编，对人物精神面貌的描摹退化为对外在行为语言的刻画，喜剧性、娱乐性被强化，人物形象的悲剧内涵被稀释。正如根据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歌舞喜剧片《高兴》（2009）把小说的悲剧结局改为了大团圆，把原著中那种让“农民工”强颜欢笑的努力进一步放大成了歌舞“狂欢”。“当代大众不可避免地告别悲剧转向喜剧，因为这样的文化消费行为和趣味类型，和整个社会的转变是一致的”（周宪317）。1996年重庆电视台拍摄的方言喜剧片《山城棒棒军》通过喜剧的方式，塑造了具有山城地域色彩的一类特殊的进城“农民工”——“棒棒”，夸张的喜剧，聚焦在“棒棒”们的“土”以及和“土”相关联的“傻”上，他们破烂的造型，土得掉渣的方言俚语，愚顽不化的表情，和城里人相差几个时代的原

始思维,很低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这是在“棒棒军”身上产生喜剧的基础,也是为城市观众“猎奇”的地方。最富喜剧色彩的是毛子,他的“憨”、懵懂、愚钝成了喜剧调侃逗乐的地方,也成了此类“农民工”的一种经典影像,在以后不断的复制中被固化和标签化了,观众在笑声中再一次消费了“农民工”,而他们的人格、尊严等难以维护的种种精神之苦却被有意忽略。

当现实中的“农民工”日渐融入城市、更多地熏染了城市的精神气质的今天,而通过影视等强势媒体改编的“农民工”形象反倒有些“农民化”了,被涂抹上了浓郁的乡土色彩。在根据赵本夫的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天下无贼》(2004年)里,“农民工”出身的王宝强扮演的憨厚、善良、固执的傻根,成了当今城市大众心目中“农民工”的形象代言。傻根在外打工五年,挣了6万块钱,打算回老家娶媳妇盖房子。在社会普遍道德失范、信仰危机的情况下,傻根像是与世隔绝的绝缘体,对谁都信任,不相信天下有贼,坚持把钱带在身边,而不是通过汇款等更安全便捷的现代方式。各路人马看似围绕着傻根的钱展开厮杀,实际上那也是人性中善恶之间的交锋,最后弱势的傻根的善良和真诚拯救了陷于迷途中的现代人的灵魂。这部有乌托邦色彩的作品无疑暗含有知识分子关于灵魂救赎的启蒙主题,失去了信念的社会,怎样重新找回失去的善良和美好。在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中,傻根所代表的弱势的“农民工”从被启蒙者,逆变为城市文明的救赎者,理想道德的捍卫者。然而,这种以一个与其说天性善良不如说对社会现实无知的“傻根”作为唤起人内心良善的力量的救赎方式却让人怀疑。从一个拒绝城市文明,拒绝现代生活方式的“纯粹”的农民身上去重拾信念,事实上这是来自城市的一种深层的心理焦虑。借“傻根”这样一种虚幻的“农民工”形象,以期道德失范、信仰失落的城市现代社会重新回到“傻根”所代表的那样一种路不拾遗的农耕文明状态。这也是城市现代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精神分裂。

王宝强在成功地饰演了“傻根”之后,基本上就以这种憨傻、纯真、善良的形象被定型,不断被复制。2010年的公路轻喜剧电影《人在囧途》里的挤奶工牛耿,与《天下无贼》里的傻根如出一辙,仅从这两个标签化的人名,就可以看出人物形象上的血缘承续关系。牛耿人如其名,不但耿直憨厚,而且透出一股倔强和傻气,四处打工的艰辛也没能消磨掉牛耿对人的真诚、热情和信任,自己身处底层,还乐于助人,哪怕被骗,仍相信这个社会上好人多。通常“农民工”的苦难在牛耿这里似乎感觉迟钝,对城市社会的复杂性、对城市“现代化”的一面也表现出相当的“无知”。如买到飞机票后,牛耿问工作人员:“我这个是站票还是坐票?”在飞机上晕机,牛耿让空姐把窗户打开透气等等。乡巴佬没见识引发的种种滑稽被夸大,成了博取“重口味”的城市观众笑声和票房的重磅调料。这使

人很容易联想到80年代初期的“陈奂生进城”,城市让陈奂生这个初次进城的农民大开眼界时也洋相百出。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进城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城乡之间尽管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和隔膜,但牛耿作为一个在城里打工多年的“资深”“农民工”,应该说也见多识广,算是半个城里人了,在如此复杂的城市生存境遇下,竟能纤尘不染,从外到内地全面保持着农民本色,这不能不说是城市文化出于自身的需要,一厢情愿地制造出来的一种“农民工”他者镜像。

和傻根一样,牛耿这样一个“正面”的“农民工”形象同样担当起了对情感和价值限于迷途混乱中的城里人进行“救赎”的历史使命。编创故意让这个被拖欠工资、生活陷入困境的挤奶工和一个婚外恋的城里老板李成功在路途中阴差阳错地纠葛在一起,囧事不断。飞机遇大雾返航,火车因塌方不能通行,公交车熄火,面包车翻车,面对这些倒霉事时,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功商务人士李成功狼狈不堪,而在底层打工生活中磨炼出来的牛耿却积极乐观。在牛耿的真诚感染下,都市浪子李成功最终回归了家庭,这意味着牛耿所代表的纯朴的“乡村”对李成功所代表的心浮气躁的“城市”再一次实施了精神救赎。这个大团圆似的结局似乎也隐喻了陷于价值混乱的城市社会对简单的乡土伦理价值的回归,向“傻根”们所代表的前现代的乡村田园理想致敬。

在“娱乐至死”的当代媒介文化语境中,看和被看成了重要的时代剧情,“农民工”被习惯性地置于看与被看的“无声”之中。一方面,他们以仰望的姿态观看、体验令人目眩的城市现代化及其带来的“震惊”。贾平凹的《高兴》(2007年)里,老实巴交的五福跟刘高兴刚进入到西安城时,“一下火车就紧张了。他的嘴张着,肌肉僵硬,天还有点凉,但汗出了一层又出一层。奇怪的是我们都穿了我们最好的衣服,现在却显得那样地破旧和灰暗。而且手黝黑,手怎么一下子就黝黑了呢?五福一直扯着我的衣襟,前脚总是磕碰了我的脚后跟,我让他不要扯我的衣襟,不扯我的衣襟又怕他走丢。”农民和城市初次遭遇时的无所适从,在高耸的城市面前他们的心理自卑和惊恐,通过五福这个夸张的憨傻形象给外化了。另一方面,作为城市的边缘性群体,他们被城市大众观看,看点就是他们那似乎被历史定格了的农民式的憨傻和单纯。他们似乎浑身涂了防腐剂,与现代文明绝缘,对现代文明下的城市病有天然的免疫力,他们忠诚、热情、善良、纯朴,他们重情重义,不谙人情世故,他们操着一口原滋原味的浓重的乡音,浑身上下都土得掉渣,表征他们不被同化、保持农民本色。他们的乡村身份在城市视点下获得了一种特殊的乡土文化意蕴,甚至他们所代表的乡村的赤贫也成了猎奇所在,成为城里人戏剧化的审美对象。电影版的《高兴》(2009年)中,顶着西瓜太郎头的胖胖的五富这个人物从演员的造型到表演,都把城市镜像中的“农民

工”憨傻的标签发挥到了极致。五福头脑简单,见人就傻乎乎地憨笑,可以为一顿饱饭而高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钱往媳妇菊娥面前一甩,说“媳妇,钱!”五福的呕吐,他的不讲卫生,他的知足,他浑身上下透出来的傻气,似乎都成了指认他“农民工”身份的标签。

20 世纪初启蒙视角下的“乡愚”,在 21 世纪初的城市文化空间里被有意识地“神化”和“圣化”了。但这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模式又不一样,“边城”里的乡民们是在他们自己相对封闭的本土文化空间里,而“傻根”们却是作为迁移的“农民工”,跨越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乡村全然陌生的现代化城市空间。“边城”那样自在自然的生命状态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他们再自绝于“现代化”之外继续保持那样一种纯粹的生命状态和固守简单的乡土伦理已不可能。“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作家来讲,再如沈从文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一样,一厢情愿地固守本已不复存在的乡村道德秩序,只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倒退。面对当下这样一种无可逆转的事实,我们倒是应该探询这些已经进入城市和将要进入城市的农民怎样开始一种适合于他们自身的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意识”(王春林 82)。在“现代”的冲击下,“农民工”们也渴望褪下农民的皮,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农民工”,他们和乡村之间的精神联系少了,和城市现代生活反倒有更亲和的一面。“没有现代生命意志冲动的神话层面的乡下人是淡泊的,也是单薄的[……]神话已经被打破,乡下人已经与城里人混杂在一起,自己也不甘淡泊、不愿居于边缘了”(徐德明 50)。然而,城里人的“集体无意识”却要让他们停留在前现代社会极有限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当现实中的乡村走向了衰败、越来越多的乡下人在进城和还乡都无以为据时,城里人也失去了乡村这个精神疗养地。在城市大踏步追求现代化、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福利时,需要纯正的农民这个他者,这是日新月异的城市日渐失落的情感和记忆。城市文化出于自身匮乏的一面,把有着乡村背景的“农民工”作为消费对象,他们就像日益稀缺的绿色资源,充当精神污染严重的城市自身的解毒剂。因此,把“农民工”定位在“傻根”这样一种脸谱化的形象中去,无论是制造喜剧效果还是实现道德救赎,也是城市中心主义创作的一种表征。这种从城市本位出发对“农民工”的他者化形塑,表面上是美化“农民工”,实则是拒绝“农民工”的融入,拒绝他们的现代性追求,从而遮蔽了“农民工”的真实心态,看不到他们心灵的蜕变,以及在城市文化空间中的自我改造和重塑。

80 年代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视野下以乡土为本位的“农民工”文学形象,凸显的倒是他们的历史主动性,而其后以现代化城市为背景的“农民工”反而被生存压迫得失去了任何主动性,乃至被以后现代的喜剧方式符号化。在城乡一体化进程日益推进的现实语境下,我们的作家该和“农民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审美和现实的距离,才

能做到既目光下沉,但同时又能站在现代化的历史高度上,文学又该如何穿透形象背后的权力合谋,去发现“农民工”真实的身影,在话语的层面使缺席者出场,在城市的历史中建构起“农民工”的生命史,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文学形象留给我们的问题和思考。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瓦尔特·本雅明:《单行道》,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Benjamin, Walter. *One - Way Street*. Trans. Wang Caiyo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贾平凹:《高兴》。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年。
- [Jia, Pingwa. *Enjoyment*.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雷达:《文学活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
- [Lei, Da. *Literature Is Aliv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5.]
- 孙惠芬:“自述”,《小说评论》2(2007):45-48。
- [Sun, Huifen. "Author's Comments." *Novel Review* 2 (2007): 45-48.]
- 汪民安:《身体、空间和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Wang, Min'an. *Body, Space and Post - Modernity*.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王春林:“打工农民现实生存境遇的思考与表达——对《高兴》与《吉宽的马车》的比较”,《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1(2009):78-83。
- [Wang, Chunlin. "Refle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al - life Peasant Workers: A Comparison between *Enjoyment* and *Jikuan's Cart*." *Liberal Arts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1 (2009): 78-83.]
- 徐德明:“‘乡下人进城’叙事与‘城乡意识形态’”,《文艺争鸣》6(2007):48-53。
- [Xu, Deming. "Narrating the Urban - Going Peasant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Urban - Countryside Division." *Literature and Art Forum* 6 (2007): 48-53.]
- :“‘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1(2005):106-11。
- [- - -. "Narrating the Urban - Going Peasants." *Literature Review* 1 (2005): 106-11.]
- 周宪:《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
- [Zhou, Xian. *A Study on Contemporary Aesthetic Culture in China*.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责任编辑:王 峰)